

哲学生命意识与现代女性的角色定位

——宿命、危机与和谐的书写流变

刘巍

(辽宁大学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 东方哲学“天人合一”的生命体认是现代女性生存的现实背景, 西方哲学灵与肉的分离对峙是她们角色困惑的精神之源。在不断的审视探索中, 女性作家在生命意识的引导下表达出对自身角色的定位诉求, 构建阴阳和谐的性别书写模式已成为一种成长趋势。

关键词 生命意识; 现代女性; 角色定位; 宿命; 危机; 和谐

中图分类号 J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09(2009)01-0119-04

哲学的滥觞源自生命与死亡相交织的困顿, 哲学的思辨又为文学提供了意义层面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生命意识是对待生命的态度及表述, 体现了人们如何安顿人生、调节人的生命秩序, 故关于人生的种种指涉都可以关联性地涵盖其中。在东方, 儒家重生命价值与意义, 道家重生命淳如、不被异化, 二者的生命阐述形成了两端的互补, 构成中国生命哲学丰富的多元文化内涵。在西方, 现代哲学强调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对峙, 更多提倡直面死亡, 阐扬死亡的非理性。在此背景下, 从五四到新时期, 现代女性的生命意识因有了对生死的切深体悟而趋于成熟, 她们对自身生命角色的认识亦经历了由“宿命”到“危机”再到“和谐”的流变。

天人合一与角色宿命

万物生命一体化是东方美学观的内核, 像中国的天人合一, 印度的梵我统一, 日本的神人统一或神我统一等。天人合一是讲人顺天意、人与天调, 还讲人与万物生命一体化、同情同构, 即人与万物相互渗透、相互依托, 万物通人性, 草木皆有情。这里,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天人合一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在此场域中的角色宿命, 就更多体现了从现实人生、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确定生命的位置, 乐生安死、完善人生。中国把价值论引入审美领域亦是由此开始, 我们在艺术创作中的拟人、象征、比兴等手法就是具体的应用, “情以物兴”、“物以情观”, “智者乐

水, 仁者乐山”等, 都充分说明了这种价值取向和审美态度。

万物生命一体化强化了中华民族的人伦意识, 女性角色及其生存便尤其打上了这种古老原始思维的烙印。在五四及新时期作品中, 现代女性的写作对于自身生存的审视并非仅是对以男权统治为中心的系统的揭露和呼喊, 而是她们对自我的认知与定位, 是对社会的参与和改造, 是女性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生存本真与生命感悟的流露表达。

一曰乐生安死, 顺应天意, 以平和为特征。所谓“存, 吾顺事; 没, 吾宁也”^{[1](西铭)}, 使得生命的追求嵌上了某种神圣的光环。宇宙的本质是“生生”, 天地有好生之德, 女人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和养育者, 对生命尤其有着“生生不已”的执着热爱。毕淑敏的小说对死亡的表现是一种审美的方式, 《昆仑殇》中死亡的肃穆豁达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也为她的小说平添了鲜活的生命分量。在西藏待了十一年的她以此质疑生命在极端生存状态下的意义与价值, 她说, 在那里, 死亡是一种必然, 活着倒是幸运的机遇, 死亡是以缺氧的形式给生命的馈赠。但是这种“乐天知命, 故不忧”的生死观也会演变成逆来顺受的人生态度, 像萧红写的“逆来的顺受了, 顺来的事情, 却一辈子也没有”的乡土人群, “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穿衣”、“人死了就完了”, 淡淡的笔调中深藏着对特定乡土社会的人性忧虑。萧红以她纤细敏锐的艺术触角写出了北中国农村生活的沉滞、封闭, 以

及由此造成的对民族活力的窒息,坚韧不拔地追逐着那躲在现实深处的古老的阴魂,直到撕去它庄严的外衣,裸露出它狰狞的面目、吃人的本质,进而深刻挖掘灵魂深处生命力被遏制的真相,揭示在礼教异化下的女性的生存困境,由此表达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暴露、呼唤和渴求。

二曰完善人生,舍生取义,以崇高为特征。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重视信念的开拓,追求个体之人与整体之德的合一,创造永恒之精神,以此达到不朽。20世纪前半叶,血与火、生与死的洗礼考验使女性大胆地走出家庭,对社会人生和民族命运进行审视与承担。这一时期的“死”已摆脱了“娜拉出走”的单一而面向更为深广严峻的现实,不只革命战士,像小资产阶级女性、阔太太、下层劳动妇女等都走进了女作家塑造的人物画廊,如《打出幽灵塔》(原名《去,死去》)等“革命文学”作品,便以自己的方式承载文化传统,甘愿为民族国家赴难。二是将某种先验的天、天命价值置于生死之上,“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2](大宗师)}。新时期文学以坚执于高邈理想和拒绝认同世俗现实的精神直面死亡,既不躲避也不寻找,而是在“我是谁”不确定的前提下坚守生命。陆文婷在生死边界的蒙太奇组接了两重矛盾:认同传统的女性角色又反叛传统对女性的束缚;既想得到社会的关心又对社会进行某种程度的嗔怪,要想二者两全,女人就必须付出生命透支的代价。儒学传统提倡的“不怨天,不尤人”在此得到认证,当人在现实中努力做当行之事,就可以通过“天”或“天命”获得支持,从而蔑视生活中死亡的威胁。

在“天人合一”的文化场控下,现代女性对生命的把握有这样的特点:一是重视对生命意蕴的探寻和生命精神的把握,欲超越生命的具体存在,上达于天地万物相通相合的那种生命本原,从终极意义上体悟生命意蕴把握生命精神;二是寻求一种物我合一的生命和谐境界,将自我融于宇宙万物之中,使女性及全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和成果符合并能表现出无所不在而又本体无形的生命本原意蕴的根本精神,以此来建构某种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

灵肉对峙与角色危机

20世纪初的“会通中西”让西方哲学渐入中国本土,“科学”“民主”吁求与“天人合一”伦理本位的差异和对立自然不可避免。不仅如此,一批现当代西方哲学大家像叔本华、海德格尔等,一改近代学人漠视死亡、回避死亡的消极态度,强调死在生中,

提倡直面死亡和向死的自由,阐扬死亡的非理性。他们在构建新的死亡哲学的同时却又营造了一种近代哲学所不曾有过的悲观主义氛围,灵肉对峙的理论多少影响和滋生出女性作家对自身生命定位的危机意识,女性历来的生存苦难、生命压抑使她们恐慌迷茫。

叔本华是现代西方哲学理论中最悲观的人,他虽将生命意志视为世界的本质,却对其彻底否定,认为意志是没有止境的挣扎,生命的本质即痛苦。他的“人生一苦海”的观点震撼了五四精神之女,个人痛苦的生命情怀、女性受歧视的历史重压、民族的忧患和人间的苦难,无不使她们恐惧彷徨,由此产生了对女性自身角色的危机意识。那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感伤与无奈,追问是主要的生存方式,问题博大而终极:人生、命运、苦难,寻求答案却是蹙眉沉思,不得要领。沈雁冰说,当时的状况是不胜幻灭之悲哀,兴奋之后的疲倦使虚空苦闷攫住了人心。所以,将死视作人生悲凉的终结也是像庐隐、石评梅、白薇、冯沅君等浪漫主义“新女性”发出的人生碰壁后的哀音。“五四”是“人的觉醒”的代名词,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男人”对“女人”的启蒙,催化了少数先行女子生命本体意识的生成,但随之也带来对生命本身的困惑,探究底蕴的结果是找到死亡这一解脱路径。她们把死想得很美好,认为它可以解脱一切缠绕,视死为完全的终点,由之返生则一切皆无意义;她们也不乏“勿宁死”的战斗精神,但只空有形而上的追问,而无实践的途径与能力;她们虽和男作家一样深深的苦闷,但她们在叩问生命底蕴的同时却是悲哀的叹美,把死当成一种抗议、一种畸形美的完成。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她们一方面沉浸在浓重的虚无空幻中,把心付给空寂;另一方面则身不由己地背着行囊整天整夜地行走,像“过客”一样伴着寂寞与孤独去战斗。“人生是时时在追求挣扎中……你我是这样,许多众生也是这样……命运是我们手中的泥,一切生命的铸塑也如手中的泥,朋友!我们怎样把我们自己铸塑呢?只在乎我们自己。”^{[3](P50)}

存在主义认为,人是具有“在世性”的,即人总是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联结着各种社会关系的。但个人与社会又是相对立的,个人力求保持独立性,外部世界却竭力消散这种个性。海德格尔的贡献在于使死亡具备了本体论的意义,他把人的存在分为非真正的存在与真正的存在,而前者是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是被异化的“沉沦”,个人“沉沦”于琐碎事物和芸芸众生之中。“新写实”小说是这

一理论的文学化,叙写生命的“被抛”状态,此在为烦所抛,又不断地抛入烦之中。方方《风景》中的七哥是“被抛”的自我,存在不由自己,本质却可自行设计和选择,而七哥的设计却让人的价值在沉重的生存中得到空前失落——七哥说,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殊路却同归,又何必在乎是不是抢了别人的营养而让自己肥绿肥绿的呢?

到了新世纪,文学呈多元驳杂状态,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作家关注社会的性质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现实的心与欲的冲撞。金钱和性占据了文学的主题,“死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充斥文本,直接的体验是对死亡的反拨也是对生命的弘扬,灵与肉对峙造成了女性生命的角色危机。具体体现为:一是符号凸现,死亡不过是符号,与生命一样有着自身属性,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混淆、动机和目的混淆并不影响死这一符号的凸现。生命的原欲成了死亡的预示,为性或是为财。二是化解理性。一部分女作家原原本本地将生存解释为本能,在这里,死不是宿命,就是偶然。如果说现代主义的生存尚有摸爬滚打后的胜利,到了这里则空余疲惫,生存的目的只在于本能需要的满足,“生命”只是一个徒具其表的形式,精神成为由本能诱发的残酷变态的心理。当这种危机意识将生存变成活着的惟一目的的时候,恐怕已违反了通过生存状态的关注而达到促进人文意识觉醒的创作初衷。

虚实相生与角色和谐

“虚”是指由“实”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的空间。“虚”通过“实”来实现,“实”在“虚”的统摄下加工,虚实相生成为独特的结构方式——将精神性的东西写成物质性的,将无形的东西写成有形的,将虚幻的东西写成实存的。虚实论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论说,认为天地万物以及一切艺术和审美活动都是虚与实的统一。《易传》说:“一阴一阳之为道”,又说:易之“为道也累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虚实是阴阳的具体表现之一,道是阴阳的对立统一。正是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的运动变化造就了万物的生化和流转,争取只是现象,和谐才是它的本质,和谐便成了现代女性在彷徨、偏激后的追求与指向。和谐包含着严格,也有宽容,和谐包含着一分为二,也包含着合二为一。

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有两种不同的自我构成:一种是基本的自我。它是一种心理的状态,是活生生的、经常在变化的东西,是渗透在“纯粹的绵

延”之中、不可测量的;另一种是“基本自我在空间和社会的表现”。在这种状态中,我们不能掌握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生活,也不是自己在思想在动作,我们的一切都是“基本的自我”在“外界的投影”,“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之外,几乎看不到我们自己的任何东西,而只看见自己的鬼影,被纯绵延投入空间之无声无嗅的一种阴影……要自由地动作即是要恢复对于自己的掌握并回到纯粹的绵延”^{[4](P159)}。女性在虚实相生的美学调试下的角色和谐,某种程度也有这种“基本自我”和“基本自我在空间和社会的表现”形式,成为另一种在男性权力场中获得的生命轨迹。

晋陆机《文赋》云:“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讲的是艺术创作中化虚为实的重要性。清方士庶在《天慵庵随笔》中说:“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曲尽蹈虚揖影之妙”,艺术家只有在“虚实相生”的基础上才算是完成了创作意图。陈衡哲在《老柏与野蔷薇》中写出了美丽柔媚的野蔷薇,虽然只有三日的寿命,却终究完成了生命的意义:圆满、彻底,尽量地陶醉,在对生存方式的选择上作者做了“辛苦的主人”,表现了她“造命”的人生态度。林徽因可以说是美的象征,视生命为至美,视死亡为至善。她把美分为个体生命之美、人生生命之美、宇宙生命之美三个层次:个体生命的美短暂珍贵,宁肯消逝也不该含有杂质;人生生命的美是选择不同的河道奔波,认命又不空然从命;宇宙生命的美是生命理想的延展,对个体生命消失的淡然泰然是将其纳入了整个宇宙,此番生命之美消失,还会有下番生命之美。是说对个体生命而言,永恒即便是谎言,但若推到宇宙的大视角,这生死的变换又不得不显得伟大了。到了迟子建笔下的乡村小镇,原始风景中人鱼可以相恋,土豆可以为农人祭奠,塔河命案与呼玛沉船等始终体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合一”的自然与人的血脉亲情,个体生命的消失会在自然中得到永恒。

中国儒道文化传统一方面强调阴阳互补、阴阳平衡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阴阳的角色分工,确定了阴不可以越界而居阳位的基本准则:“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5](P35)}即在角色意识上始终不能阴呈阳位,只能谨守“乃顺承天”的柔顺品格,以完成自己的角色使命。显然,“表面上看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主张事物的矛盾性和辩证关系,但实质上则是择其一端而舍弃另一端,暗中施行隐蔽的权力话语力

量,对‘异己’和‘他者’加以排斥,进而趋向于某种文化暴力和霸权。”^[6]哲学是意识形态的范畴,任何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女作家都有特定的思维图式,尽管这思维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但它依然无法摆脱哲学作为集体无意识形成的“定势”——女人在阴阳平衡中的弱勢。

在这种“弱勢”的现实环境里,生命意识与角色定位的追寻使女人们在经历了人与非人、集体的人与个体的人的控诉和漫长朝圣之后,终于走向男人与女人共兴共存的路径。百余年来,我们一直在说女性的反叛,先验的假设往往框定了她们的思维,对男人的批判或不屑成为了某种定势,她们在凸显自身主体过程中的偏激、偏离的情绪在所难免。实际上,我们现在所欠缺的不是女人不应该怎样,不是应拆解而是应建构,建构具有浓重人文主义色彩的女性生命意识。“和谐”强调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社会文化确证,一种社会关系,是要以女人自身的生命体验、生存经验来积累文本世界而实现对社会的认知。这样,以生命意识为基点的女性文学构筑,便开始了从生命原点出发建立“和谐”的性别关系、描绘人类“共和”图景的尝试。

也许,女性并不具有渊源流长的哲学言说传统,但她们却有几千年沿袭不变的生存经验和性别遭遇,虽有过停滞、怨愤但却显示了女性探寻、发现并试图建立独有的思维体式的探索与努力。现代女性作家话语的意义,在于她们提供了自子君以来的中国女性生存的本真状态,向未来展示了她们在面向现代之际所面临的艰难的选择:如何在取得社会角色的过程中重新整合既定的、先验的传统命运,如何打破原有的两性关系和社会秩序,如何试图在现时中寻找一种新的男女认同的关系图景。

无论对“女性生命意识”这个宏观命题存在着多少尚待厘清的概念,也无论在角色定位过程中存在多少另人尴尬的变量,女性期望建设阴阳和谐的性别书写模式已演变为一种成长趋势。总体看,目前的女性生命意识研究还缺乏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缺乏理论的中轴,这与中国整体哲学、人文背景有关,也与女性文学自身的发展有关。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是基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而发生发展的,因此,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上也是沿用西方而非来自本土。由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套用理论的过程中难免出现言

不称文、辞不达意等现象。所以说,对于和谐的追求应该考虑,哲学观统摄下的女性生命书写固然要突破传统而有所创新,但它必须接续几乎断裂了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命脉,汲取那些对今天来说仍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尘封的但并未死去的源泉;与世界接轨并非是大量引进、陈列或镜像式的上演各色的洋概念、洋观点,应有放弃地选择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理论,在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念。

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是世界上最自然、最朴素的一对关系,他们共同构成世界,共同繁衍生命。男性和女性是造物主的恩赐,没有两性,就没有这个世界的生生不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图形,那种以球形出现的无分上下左右的阴阳互生、化生万物的图像正体现了这历史的内在诉求。两性和谐是社会理想,同样也是文学理想、写作理想。男女的差异不再是压迫和霸权的借口,而是各自的优势、相互吸引的磁石,两性之间不应该是厮杀不休、两败俱伤,也不应该是对峙分裂、冰火不容,而应是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滋养。在两性和谐的土壤中,女性作家更可能跳出性别的局限,实现与男权话语的接轨,实现两性和谐的追求。“上帝造人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这决定了他们必须相依相偎才能维系这个世界……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倾斜,才能维系平衡状态”^{[7](p85)},有理由相信,这种角色定位将展示女性文学创作的新的质地和特点。

参考文献:

- [1]张载·正蒙[M].
- [2]庄子[M].
- [3]余树森·石评梅散文选集[C].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 [4][法]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5]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6]周宪·从一元到多元[J].文艺理论研究,2002,(2).
- [7]迟子建·我的女性观[A].听时光飞舞[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刘巍(1975—),女,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王敏